

西部人文集

何承文 编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西部人文集

何承文 编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部人文集 / 何承文编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 6

ISBN 7-5043-4666-7

I. 西... II. 何...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6112 号

西部人文集

编 著	何承文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封面设计	华艺工作室
监 印	赵 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宁市广香彩印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63(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4666-7/I·61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风风雨雨七十年 容兆麟·····	(1)
广西革命遗址、遗物、遗稿 黄勇祥(壮族) ·····	(25)
罗星汉传 陈祖光·····	(155)
广西将军传略 黄惠良·····	(196)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科学思想探析 陈伟波 ·····	(308)
农村小康文化建设的理念与实施对策 陈伟波·····	(319)
相思湖散曲 赖兴富·····	(332)
水龙吟 陶源·····	(334)
下涧和她的竹 陶源·····	(336)
竹风水韵醉游人 陶源·····	(339)
谒山谷祠 黄燕稀·····	(342)
山谷祠怀古 黄燕稀·····	(342)
白龙洞观石达开题壁诗 何承文·····	(344)
游刘三姐故乡下涧 何承文·····	(344)
与区政协委员游昆仑关 何承文·····	(344)
竹泉岛即景 何承文·····	(345)
竹泉岛观三角梅 江碧恭·····	(345)

梧竹观鹭江春泛	江碧恭	(345)
游北海银滩	江碧恭	(346)
合浦东坡亭	吕燕强	(346)
游柳侯祠	吕燕强	(346)
冠岩雨中观漓江	吕燕强	(347)
阳朔西街	黄勇祥	(347)
世外桃源	黄勇祥	(347)
游瑶山莲花峰	黄勇祥	(348)
德天瀑布	黄勇祥	(348)
东兴口岸有感	黄勇祥	(348)

风风雨雨七十年

容兆麟

遥远的往事，许多都随时光的流逝淡淡湮灭了。几十年风雨历程，多少人事沧桑，所能忆及的也只是挂一漏万的点滴。每当想起那漫长的艰难岁月，顿使我思绪联翩，感慨万千。

一、童年

1913年农历六月十七日，我出生于越南牧马(今高平市)。据父亲说，祖籍是广东南海县大榄乡。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祖父千里迢迢来到广西龙州投奔远亲周超记。周超记经营山杂货，为了扩大营业，周超记让我祖父进入越南高平经营山杂货。后来祖父独自经营“容权记杂货店”，成家后生下我父亲兄弟五人。我的父亲容绪，为人家做中、法文文书、会计等工作养家糊口。我的母亲黄氏桃，善良朴实，勤勤恳恳地在家操持家务。

我7岁时就在高平旅良学校读书。有一位黄廷良(又名黄孟卿)老师，是中国广西龙州县下洞乡人。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对共产党进行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黄廷良逃难到越南高平，在旅良学校任教，当了我们的老师。他时常对学生讲些革命道理，还把他带来的《新青年》(那时是恽代英同志主编)介绍给我们看。对我的思想进步起了推动作用。我二伯父容宏绪，学识渊博，精通中、法、越文。当时，广西设督办于中越边境，负责对越通商及边境外事工作，任我二伯父为镇边县平孟关隘对讯处对讯委员。二伯父想让我更好地学习中文，便带

我到广西镇边县平孟街读小学。在平孟小学我与梁静山、陈杰、陈森、冯承文、邹家兄弟等同班读书。我是高平华侨，除了会说越南话外，还会说平孟壮话。因此我和他们都很合得来。此地习俗，互相投契的成年人都结拜为金兰兄弟。我和梁静山^①等8个少年也模仿成年人，宰鸡饮酒，刺手指滴血入酒中，饮血酒义结金兰。15岁那年，我考进了中国龙州广西省立第七中学。正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州起义打响了，我亲眼目睹熊熊的革命烈火把整个龙州点燃得沸腾起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翌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我和义结金兰的兄弟们都怀着爱国热忱，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此时我们尚年少，学识浅薄，难有所作为。梁静山与我及邹家兄弟商议同赴广州求学。到广州后，我们先后在广州市镇海补习学校、广州南海中学高中、市一中、中山大学及国民大学等校就读。

二、翻开人生新的篇章

在广州求学期间，我开始阅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学校里思想进步的同学还让我借阅当时上海地下党出版的秘密刊物，如《社会科学入门》、《世界知识》等，使我的思想进步很快。

“九·一八”事变后，广州的青年学生都义愤填膺，抗日救亡的热潮汹涌澎湃，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组建起来。学生们上街游行，发表演说，演出抗战话剧、街头剧等，嘹亮激昂的歌声震撼人心。面对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蒋介石却采取对日寇不抵抗政策，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对青年学生的抗日宣传，采取血腥镇压。为了暂避锋芒，我党以“读书会”的形式组织青年学生成立了“绿波读书会”。通过“绿波读书会”联系校内外青年，引导他们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出版墙报，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激发青年们的爱国热情。

我参加了“绿波读书会”，在会中我认识了地下党员章沛^②、林端、唐超等同志。章沛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我同龄，又是同班同学。他见我学习认真，爱国热情高，1935年由他介绍，我加入了我党直接领导的“中国青年大同盟”（简称“中青”）。

“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各地学生运动汹涌澎湃，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到来了。我和章沛等同志在校内积极开展工作，组织同学们参加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拆下广东省教育厅的招牌。在校内出版抗日救亡的壁报，张贴抗日标语，向同学们介绍推荐阅读公开的进步刊物如《世界知识》、《读书生活》、《新生》、《永生》、《大众生活》等。翌年，由李木子^③做监督人，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我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为了扩大党的队伍，我首先发展培养同学刘文昭、梁静山加入党组织。梁静山同志虽然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但同情劳苦大众，抗日热情高，工作能力强。他入党后，对抗日宣传事事领先。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抗战怒潮汹涌澎湃，救亡团队纷纷成立，如“青年抗日先锋队”、“救亡呼声社”、“御侮救亡会”、“广东青年群社文化研究社”（简称青年群社）。在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潮中，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我和章沛、谭丕桓^④、梁静山等参加了广东青年群社（是地下党领导的以统战形式组织的群众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及地下活动。之后，党组织又派我和章沛、梁静山、黄文康^⑤、林惠如^⑥等到阳江、阳春、廉江等县开展工作。1938年初，我先到阳江，黄文康同志亦随后来到阳江。我们与广东阳江抗敌后援会配合开展工作，组建了“广东青年群社阳江分社”，吸收进步青年入社，发动群众，宣传抗日。

5月间，我调回广州负责青年群总社民教工作。梁静山在广州青年群社负责文艺宣传，与李端生等同志搞话剧演出、歌咏宣传活动。大家都热情奔放，发动群众，踊跃为八路军献金台捐

献；支援廖承志在广州哥伦布餐室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发动群众参加“保卫大广州”的示威游行；到医院慰问抗敌伤员，在日寇狂轰滥炸时，参加救护工作。我还负责第二服务队队长，率领队员到花县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推动抗日救亡工作。

三、撤出广州 转战粤北

1938年10月11日，日寇在大亚湾、大鹏湾登陆，广东青年群社接到党组织的指示，派我与李琼英^①（即胡明，薄一波同志的夫人）、梁静山、章沛、李端生、吕普英、王克烈等7位地下党员与宣传队队员骆励贤、吕燕华、李忠生、谭素梅等共24人组成抗日战时工作队，撤出广州，奔赴粤北曲江韶关。工作队由李琼英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梁静山任队长。经过18天的艰苦跋涉，工作队抵达韶关。我们与广东省委取得联系后，李琼英同志因工作调离工作队，金明同志^②（后改名金阳）接任工作队党支部书记，领导我队工作。时战工作队仍以抗日宣传为主要任务，到近郊各地巡回演出话剧、开展歌咏宣传。我与部分同志深入到龙归、白土、马坝等地组织农民识字班、妇女夜学班，在党的领导下，不懈地开展妇女、民运等抗战工作。不久，我被派往驻在曲江的第二十四区游击司令部当政治指导员，和游击队员们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每天除了军事操练外，就给游击队员们上识字课和政治思想教育课，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1938年底，日本耍政治诱降手腕。日本首相发表所谓“中日善邻友好”、“经济提携”等欺人谬论。国民党内部，亲日派汪精卫投降日寇。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起来声讨。值此国家多事之秋，虽说在民族统一战线下，国民党反动派却对我们的抗战宣传工作心存戒忌。国民党省党部派员来逼迫我们填表参加国民党，遭到我们工作队全体队员的拒绝。结果他们只好采用

强迫手段，断绝工作队的经费来源，把战时工作队解散了。

战时工作队解散后，上级党组织把战工队党支部的同志作了安排：李端生同志参加郭沫若同志组建的10个抗敌演剧队中的第四队，前往东江前线宣传抗战，慰问抗日战士。此时，李琼英同志已调去延安。梁静山同志出任曲江县教育局督学。我调到曲江县社会服务处任民教组长，晚上还到民校任教员，以便利用课堂培训青年学员。1939年，我奉命到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工作，以此作掩护。以后党选派我去参加在粤北山区马坝附近组织的党干训练班学习了3个月，由我负责这个班的党支部书记。受训回来后我参加党的组织员工作，负责联系部分党员，作传达报告，作监督员等。

四、开辟平孟革命根据地

1939年底，日军进攻广西，湘桂大撤退，粤北吃紧。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抗战大局，张牙舞爪到处逮捕抗日革命群众。在此形势下，中共广东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①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很重视开辟中越边境革命根据地的指示。黄松坚同志与当时任后北江特委的黄焕秋^②同志研究，认为梁静山同志是广西镇边县平孟乡人，可利用地方关系好的有利条件开展工作。我家居住越南高平，与平孟接壤，可以华侨身份往来平孟开展革命工作。根据黄松坚的指示，我与梁静山、邬也明组成一个党支部，由梁静山任支部书记，我负责组织工作，邬也明负责宣传工作。黄焕秋同志还请示了当时粤北省委李大林同志^③，李大林同志指示我们先到平孟站稳脚跟后，才将组织关系转到过去。出发前，黄焕秋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们到柳州后去找王昆仑^④同志。当时王昆仑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谋。我们到达柳州与王昆仑同志接上头后，由他介绍我们到

第四战区驻靖西指挥部属下的“边区政工队”工作，以便掩护我们的真实身份。梁静山任少校秘书，我和邬也明是少尉级队员。离开柳州，我们所带路费已用完，只好让梁静山先行，我和邬也明到南宁亲戚家暂住。路上，巧遇在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同学黄书光（又名黄东），我和他都是地下学联的党内同志。他是中共桂西南特派员，是梁游同志^③的领导人。黄书光同志为我们筹集了路费，还介绍梁游与我认识。并请来一位同志为我和邬也明作了政治形势报告。

平孟地处中越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自清末以来，便是广西镇边县边境贸易集散圩镇。其南面与越南高平省接壤，从平孟出越南溯江，行程 45 公里便可到达高平。每天都有汽车频繁往来。梁静山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虽非衣锦还乡，但挂了边政队少校秘书军衔，乡亲们对他刮目相看。梁静山为人慷慨，亲友们有困难他都能鼎力相助，群众对他很信任。我和邬也明到平孟后住在梁静山家，梁静山安排邬也明任小学教员。通过我的介绍，梁游到梁静山家住下来后，梁静山又安排梁游任小学教员。梁游原是广西地下党员，他来平孟的任务是打通中越边界，开辟左江革命根据地，组织农民武装斗争。梁静山向梁游介绍了当地的梁桂庭、何长江、谭统南及岑日新等革命同志，并引导梁游会见在溯江活动的黄国云、黎广波等越南革命同志，使梁游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我们在平孟召开了几次党支部会议。在李端生同志已从广东调来后的一次支部会议上，由于战时险阻重重，交通困难，广东地下党在短时间内还未能把支部里四个人的组织关系转到平孟来，梁静山同志心情有些沉重。会议除我们四位广东来的同志外，还有梁游同志也列席参加。因我通过桂西南特派员黄书光的介绍，知道梁游是广西地下党内的同志，因此，梁静山提出请梁游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但梁游认为他不是平孟支部成员，

与我们只是横向关系，且没有组织的正式介绍，是不能贸然担任支部书记的。梁静山也无异议，继续担任支部书记，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另一次支部会议上，大家认为以学校为阵地开展工作最为适宜。当时决定分为两个点：我和李端生同志回越南高平，在旅良学校任教员。平孟的工作由邬也明、梁游、李道英同志主持（李道英是梁静山的爱人），并定期开碰头会，统一布置工作任务。支部会议后，我们开展了以下工作：

1. 组织青年生活协进会，吸收当地思想进步的男女青年、小学教师入会。

2. 举办时事讲座，每周或半月由梁静山给青年协进会会员讲解时事及革命理论，传播马列主义。

3. 开展文娱活动，教唱抗战歌曲，如《大刀杀敌》、《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等。李端生同志从广东带来不少抗战话剧本，她来到平孟后，组织生活协进会会员排练话剧，演出了《重庆二十四小时》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4. 出版墙报，由邬学聪负责，动员会员与教师们投稿，油印散发抗战小报。

5. 开展体育活动，组织青年乒乓球赛，练习排球、篮球。

6. 组织越南高平与中国平孟两地青年互访，交流经验，开展赛球活动。

五、临危铮铮见风骨

越南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法国殖民主义者和傀儡皇朝封建势力的统治下，人民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我和端生回到高平时，正值日寇登陆越南西贡，侵入河内、谅山、高平等地。我们到高平旅良学校任教，以此公开身份作掩护。我们以平孟地下党支部为核心，以高平旅良学校为阵地，隐蔽地开展活动。我们除

了在学校团结教师，用爱国抗日思想来教育学生，教唱抗战歌曲，讲抗战故事外，还公开组织华侨青年开展文体、旅行等各种合法活动，团结广大青年。高平是我生长的地方，青年们一贯对我信赖。“高平青年生活协进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革命工作在秘密地分批进行：每次邀请三、五个朋友到我家的楼上来，介绍他们阅读从平孟秘密带进来的进步书刊与我党发表的宣言、文件，向他们报告抗战形势及日寇暴行，使他们痛恨日寇，热爱祖国，了解我党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政治主张。同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投降日寇，腐败无能等种种黑暗丑态。把皖南事变的传单、材料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扩大党的影响。第一批协进会会员是我的好友梁瑞楠^⑨、李雅高、何元贞等。随后又由他们介绍他们的朋友黄明裕、何日金等人会，女的有何修悦及李曼等人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会员，共组织了男女青年二十多人加入青年生活协进会。

在教学中，端生经常教学生唱抗战歌曲，有些歌词略为删改，避免太露锋芒。她也常在课余时间给学生讲抗战故事及日寇暴行。端生还常到学生家中串门家访。家长们有困难或有难以解决的家常事，都向端生诉说，能解决的，端生总是乐意帮助，家长们对端生很崇敬。

为了与平孟青年协进会联络感情，我组织越南高平青年生活协进会会员到中国平孟参加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以建立两地青年的感情。并由梁静山向参加球赛的越南华侨青年作时事分析报告，讲解我党的方针政策，以提高华侨青年的思想觉悟。

日本入侵越南西贡并向北越推进，在高平、凉山设立宪兵部，高平市面常有日本宪兵巡逻。越南劳苦大众与侨民手无寸铁，只能避而远之。日寇使用“怀柔政策”，邀请协进会的球员们和他们赛球。协进会会员们在党支部的教育下已提高了认识，对日寇一致采取孤立的态度，拒绝参加赛球。日本鬼子又另要

花招，宣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要高平百姓在屋顶或墙壁上张贴“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我们怎能作顺民受此奇耻大辱？我和端生与协进会的同志分头向学生家长及侨胞们宣传：要有民族气节，绝不当顺民，不贴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标语。那时高平情况极为紧张混乱，越盟（印支共产党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阵线”，是反抗法、日的统一战线组织，简称“越盟”）也发动群众起来反抗日寇。日寇凶残面目毕露，把捕到的越盟同志枪杀后割下头颅血淋淋地挂在电灯柱子上，还张贴告示恐吓：“有违抗皇军者便如此下场。”高平居民陷入惊惶不安的状态中。就在那天黄昏，有位陌生的越南人急匆匆地来到我家，面色紧张地对我说：“日本兵今晚来你家捉人。”说罢便匆匆地走了。当我回过神来，立即和端生商量：“来人说的话不知是真是假？”端生说：“宁可信其言，有备无患。”但高平弹丸之地，躲到哪里去呢？我想到母亲住的屋顶有个放杂物的小阁楼，我立即顺着竹梯爬上去，掩蔽在一堆杂物里。可是竹梯还未搬开，日本鬼子便在梁校长和何帮长的带领下冲进来了。那时端生已怀孕8个月了，父亲又卧病在床。日本宪兵首先把大门关上。端生佯装不知道他们的来意，给他们端上热茶。腰佩长剑的日本宪兵高声喝问：“容兆麟在哪里？”端生说：“他吃晚饭后上街去了，平时他喜欢去茶室或赌馆公司”。日寇进里屋把我父亲从床上拖起来，喝问：“你儿子容兆麟到哪里去了？”见老父答话支吾，日寇挥拳便打。端生和鬼子争持，护卫老父，敌人便回转身，拔出长剑要挖端生腹中胎儿，端生毫不畏惧。日寇又要端生带领他们搜查全屋，搜查至竹梯前，端生镇定地说：“这是放杂物的小阁楼，上去看看吗？”日寇打量了一下这阁楼小得一目了然，且竹梯松动危斜，日寇用电筒向小阁楼照射，没看见什么，停了一会儿，便转身过横屋搜索去了。我在阁楼上听到端生和日寇对话，精神非常紧张，心中暗自嗔怪端生。原来端生用虚则实、实则虚的战术镇定自若地与

日寇周旋，使日寇不上竹梯查看。翌日，亲友来安慰问候母亲，母亲由于惊恐过度漏了口风，向来问候的亲友哭诉说：“亚麟还在家中，不知如何是好？”端生觉得事情不妙，便叫机灵的六妹碧珍^⑤联系好友梁瑞楠，把我转移到梁瑞楠家。

日寇抓不到我，便逼迫端生交出平日与我来往的朋友名单。端生说：“我们在这里没有朋友，只能交出学生点名册。”日寇很恼火，又说了很多威迫利诱的话，端生不为所动。与此同时，日寇把那姓何的帮长抓了去，要他交出我。帮长的妻子心痛丈夫被拘押，欲救出丈夫，便不择手段，扬言出 6000 元花红捉拿我。端生忧虑重赏之下难免有贪赏者。便写了字条给六妹碧珍交给我，叫我设法离开梁瑞楠家。梁瑞楠很有民族气节，虽 6000 元也不为所动。他拿出一套越南农民服装，一顶笠帽，让我穿戴好后，由六妹望风，让我出后门跳上竹排，渡过横芽河，随后爬山越岭，艰辛地向祖国广西龙州水口跋涉。

在我离家的第三天，日寇再次来到我家中追查我的去向。端生回答说：“自从前天他出去后，一直不见回家。我正想问你们，是否把他抓去了？”日寇不容分说，把端生推上车，载到一间小房子里囚禁起来，三天不给饮食。已怀孕 8 个月的端生，其凄苦难以言状。日寇对端生施以威迫利诱，端生始终不屈。第四天，学生家长联名保释，日寇才把端生释放回家。原来狡猾的日本鬼子在释放端生之前，已把我患病的父亲抓去。端生回到家中，得知老父无辜被牵连受害，于心不忍，赶到拘留老父的地方，要求日寇释放父亲，自己甘愿替父亲承受一切。岂料日寇在释放端生之前，已把老父押解去谅山日本宪兵部了。端生无法营救老父，极为悲痛。很久以后，我才得知父亲在日本宪兵部备受折磨，被打得死去活来，双腿已残废。折磨了半年多，日寇才释放我父亲。家人用担架把父亲抬回家中，治疗不愈，不久便去世了。入葬时，越南高平几位地方领导同志亲临吊唁，并派军乐队

沿途奏哀乐，直到墓前吊祭。至今，我每忆及此，不禁悲泪滂沱。

七、出虎口又陷狼窝

端生仍回旅良学校上课。她除了接触学生外，不和校外人交往。但狡猾的日寇仍寸步不离地盯梢。一日课间，端生到厕所净手，同校的谢玉英老师（中国广西龙州南街人）也进厕所来，谢老师递给端生 50 元东洋币，说这是学生家长们送来的，叫端生立即离开高平，日寇将于日内再次逮捕她，并告诉她晚上出后门下河边，家长们已备了小船送她出境（我家后门是条小河，可直通中国广西龙州水口）。这时候，端生身怀六甲已临产，为避免落入日寇魔掌，当天晚上端生匍伏在小船底，用渔网复盖掩蔽，在黑夜中船家撑船离岸后不久，便见岸上灯笼火把齐明，枪声四起。幸而水顺船快，此时船已开出好远了。

从越南高平到中国龙州水口只须几个小时便可到达。这条水道据说过去除了走私鸦片的船驶入外，一般不作通航道。护送端生的船靠岸后，前滩全是稀泥浆，端生插足进去很难拔出。船家一步一扶持，端生仍多次跌倒在泥浆里搅得像个泥人。好不容易才爬上岸来，但见晨曦中路上行人稀少。端生由船家引至水口李合昌先生家^⑨。李合昌的妻子对端生的到来极为惊讶，后经介绍，才热情接待。

我经过十多天的艰辛跋涉，在乡民的引领下也终于到达水口与端生汇合。

为了生活，我和端生来到南宁，在民权路租了一间小房子住下。没几天，端生分娩了，生下第一个女儿丽曼。这时候，端生身体很弱，没有乳汁，也无婴儿衣物，这个小生命怎能活下来长大成人？正巧乡亲黄宝珠要回越南高平，我们便买了两小罐牛奶，把出生才 18 天的丽曼托她带回高平交给我母亲抚养。

在南宁，我们设法多方联系，始终得不到梁静山同志的消息，他们是否还在镇边县平孟也无从得知，我们一筹莫展。后来得到朋友叶长侠的介绍，端生到大厦中学任女生导师兼初中文史教师。我到亭子南宁高中任代课教师。我们满以为脱离了日寇的魔掌便可风平浪静了。岂料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平日我惯于看书读报，每晚都到生活书店翻阅一些进步书籍，也希望能碰到党内的同志。端生的工作作风，口不离抗日救国，课堂上常向学生灌输革命理论，课外又向学生讲抗战故事。学生常常围在她的身边。因此又招来横祸，再进虎口。

1943年2月间，我俩被广西伪警察局逮捕。我俩原在南宁民权路居住，但端生任大厦中学女生导师，必须住在学校女生宿舍。一天深夜，警察在民权路住所搜去我的抗战歌曲集及书报，并逮捕我，押到警察局。天亮后，警察叫与端生同住的阿婆进大厦中学去找端生，两名警察隐蔽在校外。阿婆见了端生，撒谎说：“容先生病重，叫你马上回去。”端生不知是计，急忙请假随那阿婆回家。刚步出校门，两名警察便冲过来把端生逮捕了。我和端生被关押在警察局拘留所内，经过一番简单问话后，惨无人道的警察反绑了我俩的双手，派8名警兵押解我俩沿中山路到绥靖专员公署。我俩分别被囚在两间仅容一个床位的小房间里，每天只给吃一团小米饭和几个辣椒。伪专员兼保安司令李画新和副司令黄绍礼，天天分别提审，严逼我们供认是广东共产党派到中越边境企图搞武装暴动的共产党员，还代越共收购枪弹，并经常到平孟开秘密会议等。我俩矢口否认，没有在敌人面前暴露党员身份和组织关系，更没有自首悔过出卖任何同志。敌人抓不到证据，扣押了我们三个多月，不得已把我们释放了。释放那天，敌人把搜去的抗战歌曲集、进步书籍放火烧毁了。